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09 年 04 月 (总第八期)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 2009. 04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433)

目 录

一、	四月学术工作	3
二、	学术来访.....	4
	◇ 复旦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先生来复旦大学讲学	
	◇ 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来访高研院	
三、	学术出访.....	5
	◇ 邓正来教授和孙国东博士参加“中国法学发展的经验与反思”研讨会	
	◇ 邓正来教授应邀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	
	◇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首届人文社科评价暨第 5 届科研绩效评价国际研讨会	
四、	特聘教授就职讲演.....	7
	◇ 郭苏建教授主讲“民主转型的理论与模式”	
五、	“博雅讲堂”走进复旦, 邓正来教授做讲演.....	10
六、	中国与世界: 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11
	◇ 第十期: 汤一介先生主讲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 第十一期: 邓晓芒教授主讲“‘自我’的自欺本质”	
	◇ 第十二期: 俞吾金教授主讲“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七、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 青年学术沙龙.....	19
	◇ 第七期	
八、	双周学术午餐会.....	21
	◇ 第三期	
	◇ 第四期	
九、	刊物出版.....	23
	◇ 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总第 26 期出版	
	◇ 高研院兼职教授徐贵新著《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出版	
	◇ 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日文版全本出版	

十、	媒体报道.....	27
◇	《人民政协报》报道邓正来教授讲演：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	
◇	Shanghai Daily 报道 Jeffrey 讲座： Baozi-meets-sushi like	
	baozi-meets-hotdog	
◇	《文汇报》报道汤一介先生讲座：中国更应关注自身文化主体性	
十一、	学术工作坊.....	36
◇	《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结束	
十二、	附录.....	36
◇	出版资助基金项目申报启事	

一. 四月学术工作

1. 学术来访：复旦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先生来复旦大学讲学；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来访高研院；
2. 学术出访：邓正来教授和孙国东博士参加“中国法学发展的经验与反思”研讨会；邓正来教授应邀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首届人文社科评价暨第5届科研绩效评价国际研讨会；
3. 特聘教授就职讲演：郭苏建教授主讲“民主转型的理论与模式”；
4. “博雅讲堂”走进复旦，邓正来教授做讲演
5. “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举行第十期：汤一介先生主讲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第十一期：邓晓芒教授主讲“‘自我’的自欺本质”；第十二期：俞吾金教授主讲“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6.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青年学术沙龙”举行第七期；
7. “双周学术午餐会”举行第三期、第四期；
8. 刊物出版：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总第26期出版；高研院兼职教授徐贲新著《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出版；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日文版全本出版；
9. 媒体报道：《人民政协报》报道邓正来教授讲演：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
- 展；Shanghai Daily 报道 Jeffrey 讲座： Baozi-meets-sushi like baozi-meets-hotdog；《文汇报》报道汤一介先生讲座：中国更应关注自身文化主体性；
10. 学术工作坊：《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结束；
11. 附录：出版资助基金项目申报启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04-30

二. 学术来访

复旦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先生来复旦大学讲学

4月13日，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邀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先生来复旦大学进行访问和讲学。

下午两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高研院学术顾问秦绍德教授在光华楼会晤了汤一介先生。秦书记代表复旦学生感谢汤先生八旬高龄专程来复旦讲学，并向汤先生介绍了复旦在培养学生具有深厚扎实的知识基础方面的探索。汤先生对复旦大学重视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着眼长远发展的做法表示了赞赏，同时还介绍了儒藏研究工程的进展情况。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参加了会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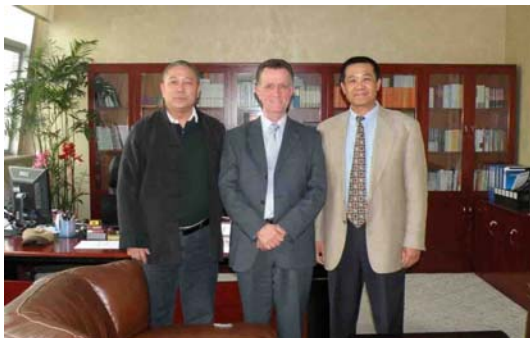
会晤结束后，邓正来教授陪同汤先生参观了高研院。



下午三点半，应高研院和邓正来教授邀请，汤一介先生在光华楼东辅楼 103 报告厅做了题为“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讲演。

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来访高研院

4月27日下午，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的邀请，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先生来访复旦高研院。



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和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会见了费约翰先生。双方就高研院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项目和未来的研究计划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愉快而深入的商谈，并在合法性与治理、中国市民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关键词研究、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中国执政党的建设与改革、中国选举政治发展、中国大战略和中国法律改革与法律教育等领域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双方商定，将就这些研究项目的合作方式作进一步的商讨。

三. 学术出访

邓正来教授和孙国东博士参加“中国法学发展的经验与反思”研讨会

4月11日，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应邀参加了由华东理工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心、上海市法哲学研究会和上海苏商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法学发展的经验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中，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沈国明、倪正茂、孙笑侠、刘旺洪、孙莉、李瑜青等近20位法学专家围绕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理想图景”、经验研究、法学流派、去泛政治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邓正来教授应邀为大会做学术总结。他主要就法学研究中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法学研究背后的哲学承诺和全球化时代法学概念系统的更新等三个方面对诸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同时也回答了入会学者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动向、市民社会理论与治理理论之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提问。

邓正来教授应邀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

4月18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做客“天一讲堂”，为宁波市民带去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精彩讲座。



邓教授从中国与世界结构的关系和中国发展的自身结构两个背景谈起，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问题和使命。

他指出，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被迫进入了世界，但事实上，中国未被纳入到世界结构中，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WTO后，中国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到了世界结构中。但是，中国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并未进入“世界游戏”的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关键在于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否有一个“理想图景”，而如何锻造提供这种图景的能力，正是中国社会科学所担负的重要使命。

接着，他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一、引进阶段，即大力引进西方知识；二、复制阶段，试图用西方观点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三、与国际接轨阶段，即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西方化，其结果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丢失”了本应作为我们思想根据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唯学科化，即仅用某一学科知识分析问题，其后果是“肢解”了原本作为整体性研究对象的“中国”，因而无法整体性地解释中国所存在问题的复杂性。此外，中国社会科学还存在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问题。



展望未来，邓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走向世界，要提出关于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理想图景”，真正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必须打破“西方化”，“唯学科化”和“知识地方主义”，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实现知识转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下转型中国进行深度研究。

演讲结束后，邓教授就现场听众提出的问题一一予以解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据悉，“天一讲堂”是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宁波市图书馆承办的公益性文化讲座，开设于2006年4月，目前已成功开逾百次，成功邀请茅

于轼、朱学勤、徐友渔、萧功秦、易中天等著名学者做客讲堂。短短数年，“天一讲堂”便深受市民喜爱，已逐渐成为宁波的城市文化品牌。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首届人文社科评价暨第5届科研绩效评价国际研讨会



2009年4月2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了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主办、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承办的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暨第5届科研绩效评价国际研讨会。来自教育部、台湾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等单位的王宁、刘大椿、邱均平、任剑涛、黄慕萱、叶鹰、苏新宁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国际研讨会。

在4月24日上午第一单元的讨论中，邓正来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学术期刊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当下使命”的基调发言。他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中立性、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存在的瓶颈、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如何走向世界等问题的看法激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四．特聘教授就职讲演

特聘教授就职讲演：郭苏建教授主讲“民主转型的理论模式”

4月7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郭苏建博士特聘教授就职讲演仪式。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桑玉成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出席论坛。

讲演由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讲演人郭苏建教授的个人简历、研究领域和成果，并介绍了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点评嘉宾陈明明教授、郭定平教授。





讲演前，桑玉成教授代表复旦大学为郭苏建教授颁发了特聘教授聘书。之后，郭老师做了简短的就职感言，并感谢邓正来院长、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对他的信赖和重托，表示愿为高研院乃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把复旦大学高研院建设成世界第一流的学术重镇做出自己的贡献。



接着，郭教授做了题为“民主转型的理论模式”的讲演。他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西方学术界对民主概念的不同界定：程序民主、实质民主以及中间理论对民主的界定；第二、民主转型与自由化、民主巩固等概念上区别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前几波的区别；第三、民主转型的四种理论研究路径，即结构主义学派（即结构论）、精英战略选择学派（即过程论）、制度主义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并对各个理论学派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第四、民主转型模式，即政府主导的转型、体制外力量主导的转型、体制内外精英协定式的转型、国家外部干涉性的转型，并对不同转型模式的特点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第五、不同转型模式对转型

后果的影响，即对民主巩固的持续性与民主质量影响。上述研究是基于郭教授对 1900 年以来 128 国家的民主转型的经验观察，涉及到全球五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威权体制。郭苏建教授的演讲为民主转型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路径和方法。

郭教授讲演之后，陈明明教授首先做了点评。陈教授根据他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民主转型的一些经典著作的理解对郭教授演讲中所谈及的民主界定、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理论建构、民主转型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最后他还提出，民主转型的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政治变化，能否指导中国的政治变革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郭定平教授接着做了点评。在对郭教授的研究作了积极肯定的同时，他从理论分析范式和转型模式分类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在理论分析范式方面，他认为，在“结构论”与“过程论”之外再加其他理论分类有导致复杂化的危险；在转型模式的分类方面，郭苏建教授特别增加了“外力干预型”作为第四类，这曾被亨廷顿所忽略，但郭苏建教授对不同类型的外来干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似乎分析得不足。

点评之后，在场学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 and 存在的疑惑进行了提问。如拉丁美洲的民主问题；一党制条件下能否实现民主；转型模式的后果；军人政府与文人政府的问题；教会对民主的影响等。郭苏建教授都一一做了解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第一、民主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东西，但在当下的政治架构中却是一个可欲的东西。这是为什么？第二、民主的关键或核心是选举，而选举是人数的问题，选举制度的设计背后预设的是对个体人的理性选择能力的某种确信或确认。那么，又如何看待这种理性确信？第三，民主最核心的要素是平等，但对少数人却不平等，这怎样解决？邓教授指出恐怕我们要从源头重新考虑“民主”这种制度安排。

特聘教授就职讲演是高研院的常规性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次讲演气氛热烈，观众参与踊跃。郭苏建教授关于民主转型的理论分析以及评论人和观众的讨论开放出了很多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五. “博雅讲堂”走进复旦，邓正来教授做讲演

“博雅讲堂”走进复旦

邓正来教授做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讲演

4月22日下午，由上海市科教党委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协办的“博雅讲堂”在我校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开讲。本期“博雅讲堂”邀请我校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讲演。

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中，邓正来教授从全球化的时代性质、中国改革中的生存性智慧等国际国内背景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于全球化的时代性质，邓教授首先指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得以出场的两个背景：其一是社会结构性背景，其二是思想背景。就前者而言，中国自1978年、特别是进入WTO以后开始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之中。为此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世界游戏的规则。

但是，有发言资格未必就等于有发言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这种资格对我们而言只是形式而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就后者而言，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不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特定时空中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丧失了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因为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也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就中国30年的改革而言，邓教授强调我们不可忽视（相对学者的理论性智慧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性智慧所具有的作用。中国并没有遵循前苏联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这其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解释。

接着，邓教授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所存在的三大困境。一是“西方化困境”，即30年来经过“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等三阶段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西方化倾向”。二是“唯学科化困境”，即由于没

看到教学中的传承性知识与研究中的解释性知识之别而在学术研究中趋于“学科导向”，而这种趋向根本没有看到当下转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所有的问题都处于变动中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共时性”（他以“生存权”与“环境权”为例，说明西方“生存权”与“环境权”诉求是按自然时间展开的，而在中国却是共时性出现的）。三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全球化时代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而使得非预期后果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基于上述认识，邓教授最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是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邓教授强调：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研究，并以中国为根据建构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图景”，进而影响全球化的性质与方向。

演讲结束后，听众们分别从“有限理性”与理想图景的确立、“国情说”的局限、中国有无制度创新能力等问题与邓教授展开了讨论。

博雅讲堂是上海市科教党委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整合学校与社会资源，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在2007年下半年所创新的一项主题教育形式。它旨在以名师名家的讲座形式，向上海大中学生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民族文化、公民人格、社会责任等系列教育，以博励学，以雅弘德，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开讲两个学期以来，博雅讲堂已在42所中央部委属高校与上海地方高校举办56场讲座。

六、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第十期：汤一介先生主讲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4月13日下午3: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十期主题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复旦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先生担任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姜义华先生，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他首先简要介绍了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经历，介绍了担任评论嘉宾姜义华教授和许纪霖教授。

讲演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汤一介先生颁发了高研院学术顾问的聘书。



接下来，汤先生做了题为“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主题讲演。他指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逐渐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很多学者特别注意论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其价值所在。汤先生指出，发生这种情况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形势有关。从西方殖民体系中解放出来的民族为了建立或复兴自己的国家，有一个迫切的任务，他们必须从各方面自觉的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特有文化正是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普遍主义”的思潮，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并不具有或者甚少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某些取得独立的民族或正在复兴的民族，也受到“普遍主义”的影响，为了强调他们自身文化的价值而认为他们的文化可以代替西方文化而成为主导世界的“普世”文化。

汤先生指出，当前各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维护文化的多元发展，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反对“普遍主义”，是不是就要否定文化中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说，在不同民族文化之中可以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而这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应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为不同民族所接受，而且这些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观念又往往寓于特殊的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中。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普世价值”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的同时，应努力寻求人类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因素及其意义。



如何寻求人类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汤先生提出了三点：第一、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原来就有共同的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念，这些共同理念无疑是有“普遍价值”的意义；第二、在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理路中寻求“普世价值”。例如中国儒家的“仁”，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印度佛教的“慈悲”虽然形式不同，出

发点不同，甚至理路中也有差异，但却都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第三、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创造出的某些特有的理念，往往也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

最后，汤先生简要分析了他对“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对“多元现代性”至少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解释：一种是现代性是多元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现代性”，另一种看法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有着共同的基本内涵，只能是不同民族进入现代化的道路、形式和实现方法等方面的差别。就此，汤先生通过分析严复的观点，认为第二种意见可能较为合理。



姜义华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汤一介先生说明了为什么要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它又为什么可能，如何实现这种可能。还提出了“和谐为体，中庸为用”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体与用，这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而我这里想强调的则是，如何自觉地意识到每一种特定的文化都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或非普遍性，非普世性。”姜教授例举中外学者关于中西文化类型的分析，例举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关于知识限度的认识，从而指出，“只有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能达到的限度，才能虚心地学习新的东西，才能积极吸取其他文明，其他文化优秀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普世价值的认定的真实含义，丝毫也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它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许纪霖教授指出，他非常赞同汤先生报告中的基本看法。许教授认为，第一、非常赞同汤先生把“普世价值”与传统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所做的区分，这个区分对我们今天理解“普世价值”有很大的意义。第二、许教授分析了他所理解的“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他认为，不能够把“普世价值”理解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我们只是去简单的认同。汤先生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解为我们思考今天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所负有的责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许教授还谈了他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以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点评结束后，在场的同学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如文明的学习过程是否就是文明内涵逐渐趋同的过程，如何理解“普世价值”核心范畴，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价值观念等。就此，汤先生做了细致的回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汤先生今天所阐述的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

个时候以这种方式重新提出来。学者关于普遍价值的争论背后到底在担心什么？关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在邓教授看来，最要害的问题是谁为我们立法的问题，谁来为我们的生活确立一种判准的问题，这恐怕值得我们继续追问。

本次讲演现场座无虚席，听众反映热烈。汤一介先生关于“普世价值”与“普遍主义”的界分，以及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担负的使命等问题的分析，评论人和听众围绕此问题的讨论都开放出了很多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



讲演结束后，汤先生应邀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就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儒藏》编纂与研究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第十一期：邓晓芒教授主讲“自我的自欺本质”



2009年4月23日下午15: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十一期讲演。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委员邓晓芒先生为复旦师生带来了题为“自我的自欺本质”的学术讲座，同济大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所所长陈家琪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并为邓晓芒教授颁发了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委员”的聘书。



邓晓芒教授从“自我”的词源剖析入手，通过对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的揭示，从人性高度揭示了自欺作为人之“原罪”的普遍性，进而分析了自我批判与自我忏悔相对于独立人格的必要性。



首先，邓教授从西方语言和汉语词源上对“自我”作了详细的探究。他指出：在西方语言中，“我”作为人称代词，不同于作为名词的“自我”，前者没有对象化、表象化。“自我”意味着某人的自我，作为反思的对象，具有了第三人称的性质；“我”是进行反思的我。据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应表述为“我思故自我在”。西文的 Selbst (self) 和汉语的“自”、“自我”意思大致相当，但词的原义和引伸义之间的结构却是相反的：在汉语里是推己及人、及物，而在西语里是由物而返己。

其次，邓教授从“意识”中我与对象的辩证关系入手揭示了“自我意识”的矛盾，进而揭示出自我的自欺结构。他指出：意识首先就是把自己和对象区别开来的意识，当一个人分不清自己和对象了，我们就说他“丧失意识”了。但另一方面，意识又必须是对自己和对象的某种本质联系的意识；用黑格尔的话说，意识就是把我和对象区别开来，同时这种区别又是没有区别。这是因为这个“我”已经是作为“对象”的我，而这个“对象”是“我”所意识到的对象，“我”的所有的对象共同组成了“我”的内容，它们才是真正的“我”，而离开这些内容的空洞的“我”则什么也不是。因此，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真正的对象意识就是一回事。自我只有当它不是我而是对象时才是真正的自我；对象只有当它不是对象而是自我时才是真正的对象。可见，自我意识要把不是自我的自我“当作对象”，把不是自我的对象“当作自我”来看，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欺。邓教授说：“人在骨子里就是一种自欺的动物，他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结构。他总是要假装相信某些东西，是因为他只有把某个对象‘当作自我看’，他才是真正的自我；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知道那个对象并不是他的自我，他其实是有能力拒绝诱惑、反抗权威的。”



最后，邓教授还结合生活实践论述了自欺的普遍性以及自我批判、自我忏悔相对于独立人格的必要性。他认为，自我意识的自相矛盾或自欺仍具有正面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只有超出形式逻辑和日常知性思维之上才能够看得出来的。知性只知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辩证的理性却知道，当我“是”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因为它既然由我自己“是”起来，我也就可以不“是”它，而且批判它。自欺是人类的无奈，人的有限性使人永远摆脱不了一定程度的自欺，也可以说，这是人的原罪；但人可以用自己的带罪之身投入一项崇高的事业，一

件改善目前人性状况的事业，这也是人本质上的原善。因此，真正能够解决自欺的自相矛盾的不是“返身而诚”（孟子），也不是老谋深算地躲进“环中”（庄子），“难得糊涂”（禅宗）地逃入虚无；而是在行动中对自身人性自欺结构的清醒意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忏悔精神。就此而言，真正的自我其实既不是欺骗者，也不是被欺骗者，而是忏悔者，但它永远不能完成，即永远在路途中。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或民族，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免犯错误，但不会老是重复已经犯过的低级错误。



陈家琪教授主要从启蒙理性的视角对邓晓芒教授的上述观点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西方基督文化使人们意识到上帝，但也意识到自己不是上帝；启蒙思潮则使我意识中有我，我就是我，即自我。在他看来，邓晓芒教授其实继承了启蒙精神，也是要唤醒对我的意识，但在邓教授那里，则是要唤醒人对自欺的意识，而这包含着对人性的深刻反思。他还结合萨特、张世英等的相关论说进行了阐释。

刘清平教授则主要结合邓晓芒教授的“新批判主义”和“自否定哲学”对邓教授今天的演讲进行了解读。他认为，邓教授对自我意识自欺结构的揭示在某种意义上是其“自否定哲学”的起点，也是其“新批判主义”得以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提升至“人性批判”层面的关键所在。他还从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观念入手对邓教授关于自欺结构的揭示进行了重构，同时对中国文化欠缺自我批判精神进行了阐释。最后，他还提出几个疑问：如果自欺是一种根本恶，这种认识论层面的“假”如何转化为道德层面的“恶”？具有较强理性气质的自否定哲学何以应对当前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解构？



演讲结束后，听众们就鲁迅是否是独立人格的代表、“范跑跑”问题等与邓晓芒教授展开了讨论。

第十二期：俞吾金教授主讲“启蒙的缺失与重建”



2009年4月29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行第十二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潘德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俞吾金教授及其主要研究领域，介绍了两位点评嘉宾潘德荣教授和罗岗教授。讲演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俞吾金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聘书。



接下来，俞吾金教授发表了题为《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的讲演。俞教授首先向听众呈现了他讲演的四点，即启蒙：当代中国文化的主题；启蒙的缺失：历史和现状；启蒙的缺失：原因的探寻；启蒙的重建与修正。



在第一部分“启蒙：当代中国文化的主题”中，俞教授从时间的两种观念，即编年史的时间观念和形态学的时间观念入手，引申出“启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的结论，并分析了启蒙的主要原则：理性法庭、世界祛魅、追求平等、个性自由。第二部分“启蒙的缺失：历史和现状”首先回顾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三部曲：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再者分析了当今现实中启蒙的缺失：一是宗教观念的蔓延和迷信思想的泛滥；二是等级观念的复苏和特权意识的肆虐；三是怀旧意识的流行和传统观念的复魅；四是集体观念的统治和自由个性的湮没。

第三部分“启蒙的缺失：原因的探寻”，俞教授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启蒙缺失的主要原因：一是救亡对启蒙的挤压；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三是自然科学的萎缩；四是社会性的宗教改革和批判运动的缺乏；五是西方学者启蒙批判的影响：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最后一部分“启蒙的重建与修正”中，俞教授指出了重建与修正启蒙的主要路径：一是遏制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权力寻租现象，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二是借鉴欧洲的启蒙成果，尽快制定民法典，使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三是弘扬启蒙的主导精神和普遍价值；四是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学者对启蒙的批判，遏制启蒙向神话的转化；五是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启蒙要素：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六是重塑中国人的国民性（确立普遍的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

潘德荣教授首先对俞吾金教授的讲演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时间概念是西方哲学里面最复杂的概念。接着，对于启蒙——这一当代理论热点，潘教授提出质疑，中国现在所处的状态与西方当时的状态是否平衡？启蒙运动在中国复兴的可能性何在？如果在中国进行启蒙运动是不是先要来一场文艺复兴？



接着，罗岗教授进行了学术点评。在俞教授有关重建启蒙的讲演中，他体会到了俞教授对时间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东西方文化方法论的比较、对中国现实的高度关怀。同时，他提出两点感受，第一，双重时间性问题，他指出同时做到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两方面，可以实现编年史时间观念和形态学上的时间观念的有机对话；第二，启蒙本身内部有多重的声音，存在紧张的关系，要采取更加复杂全面的态度去理解启蒙。



讲演和点评之后，在场的听众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问题，如中国发展是否要“走回头路”的问题，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否含有启蒙运动的要素，等等。俞吾金教授就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邓正来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强调，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全部的可能性都建立在时间观上，要重视作为前提的时间观。这场讲座最重要的恐怕即是需要我们对时间观有个重新的或更深的认识。



本次论坛,俞教授从历史和现状的角度回顾了启蒙运动,分析了启蒙的缺失,提出了重构启蒙的理念。其中,时间的概念贯穿始终,向在场听众展现时间在编年史和形态学上的概念以及强调作为前提的时间观念的重要性。

七.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 青年学术沙龙(第七期)

4月15日下午3:0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青年学术沙龙”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七期讨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葛四友,日本广岛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梁捷应邀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沙龙。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出席沙龙的演讲嘉宾以及点评嘉宾,并为三位讲演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青年学术沙龙演讲嘉宾聘书及赠送了高研院图书。



首先,葛四友博士做了题为“分配正义与运气”的讲演。他首先阐述了分配正义和运气的概念,并指出他的讲演希望通过从“如何处理运气来看待分配正义”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的分配正义问题,从而引起大家的反思。接

着,他列举了西方学者对运气的分类,如罗尔斯的“自然性运气”与“社会性运气”,德沃金“原生运气与选择运气”,内格尔的“构成性运气”与“外在运气”等等。接着阐述了基于这些分类而产生的分配正义观念,如德沃金的资源平等、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诺齐克的自由至上论、柯恩的中期福利平等,等等。

梁捷的主讲题目为“熊彼特主义与当前金融危机”。首先,他指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学接的主流看法,即“经济周期理论”已经过时,



任何经济周期都可以为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所抵消，但无法解释当今的金融危机。而熊彼特则认为经济周期是“真实的”，必须正面构建和描绘出经济周期；第二，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外部因素，即创新所导致，应将创新而非价格作为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第三，真正的知识，应该是“知识的知识”，无法被教授，只有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才是真正的只是投资。最后，他总结到，熊彼特主义的复兴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创新”和“知识”的重新认识，知识或企业家精神的复苏，才是经济复苏的最初、最重要的标志。



陈云博士的讲演以“中国开发模式的特点和未来走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为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对转型体制的研究。她指出转型的问题，最终是人的问题，如人口工业化率、民生问题与分配机制问题。第一、比较了邓小平开发模式与毛泽东开发模式；第二、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30年以及对未来30年的借鉴与反省；第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民主并非口号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第四、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探讨中国的制度延伸的可能性；第五、大国的崛起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保护主权有更好的方法而非战争。

三位嘉宾的讲演结束后，在场听众针对他们的报告纷纷提出问题。如，怎样抵消运气所带给人的不平等；产业结构、资源配置与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技术进步与创新与经济的关系；英国的民主问题；宪政体制在英法等国的表现及影响，等等。嘉宾和现场听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清平教授对今天的讨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第一、葛四友博士探讨的是西方政治哲学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怎么理解平等。葛博士探讨了从运气的角度理解平等，他对西方各理论有着很深的梳理和了解，而且如果把这种西方语境下产生的问题和中国文化本身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会更有价值。第二、梁捷的讲演可以总结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重视非主流的原创的思想，这些可能提供出很多主流思想提供不了的问题，重视亲身体验和经历产生的知识，而不是课本知识。第三，刘教授指出他和陈云博士的价值观念接近，同意陈云博士的“转型的问题实质就是人的转型”这一观点，以及民主不是终极价值、绝对价值，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民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他通过足球场的例子，指出，人们在关注理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理性之外东西。同时由于路径、学术资源的约束，一些潜伏在日常面相背后的、符合人生生活的东西被遗漏了，应该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本次沙龙主讲嘉宾与大家分享了不同学科的问题,同时给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如何处理追求个人幸福的人们行动。

八. 双周午餐会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三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4月1日中午12: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高研院2812室“思想者学苑”举行第三期双周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蓝佩嘉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张仲民博士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主持本次学术午餐会。



姜义华教授围绕“中国近代史漫谈”这一主题,主要探讨历史研究中的史实再发现问题。他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历史资料的毁坏,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诸多的困境,他以共和国史为例分析了历史的解释与重构问题。

蓝佩嘉博士介绍了她的著作《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的主要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体会。对百余位的印菲雇佣以及台湾雇主的访谈,深度解析了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姜义华、蓝佩嘉两位教授的问题意识均关涉“事实之真”与“接近原貌”。司佳博士和张仲民博士也结合此论题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在场的高研院人员围绕此话题展开了轻松的讨论。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另两位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加以思考讨论，推进高研院学术研究，促进跨学科同行间的交流。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四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4月29日中午12: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高研院2812室“思想者学苑”举行第四期双周学术午餐会。根据目前中国学术出版和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期讨论主题确定为“学术出版与量化的文科评价体系”。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邓建国博士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主持本次学术午餐会。郭苏建教授、陈润华博士、王勇博士、孙国东博士、邓正来教授、陈晔老师、黄倩老师和龚智慧同学参加了讨论。



主讲人任远教授围绕“学术出版与量化的文科评价体系”这一主题，首先指出定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可能是导致当前学术浮躁现象的外在诱因之一，而教育主管部门新近出台的关于学术评价的指导意见也说明了定量化的科研评价遇到了瓶颈。但是任教授同时又指出，不能把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割裂开来，量化评价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积极性的，评估体制需要量化但不能僵化，需要辅以其他评价体系加以完善，其中包括代表作评价、创新性评价、应用性评价以及社会影响力评价等。最后，任教授指出不能变量化管理为简单化管理，需要寻求一种适应知识生产机制的管理。

孙晶副总编指出在出版界也存在着量化现象。她结合出版业的实际情况分析指出，出版业的量化情形与学科性质有一定的关联，不同的学科的知识生产周期不同，因而量化评价体系对不同学科的影响也不一样。



邓建国博士基于自身的科研秘书与教师的双重身份体验,指出量化机制与年轻教师做学问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认为量化是必要的,但应改进使其既方便管理又贴合人的感受。

与会人员针对量化与学术评价标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郭苏建教授介绍了美国高校中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起来的评价体制;邓正来教授指出了中美两者之间评价机制差异源于中美的背景文化和环境支撑不一样,等等。大家还就中国当下的图书出版的运作与学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流。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另两位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加以思考讨论,推进高研院学术研究,促进跨学科同行间的交流。



九. 刊物出版

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总第 26 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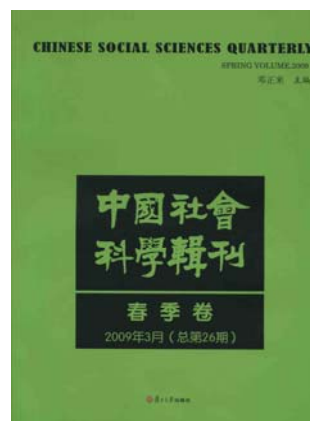
卷首语: 重新发现中国邓正来

主题研讨: 重新发现中国

- | | |
|-----|-----------------------|
| 许纪霖 | 大我的消解: 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 |
| 吴炫论 | “中国现代自由”观建构中的若干“中国问题” |
| 王岳川 | 美国金融危机与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 |

学术专论

- | | |
|--------|-------------------------------|
| 姜义华 |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史学: 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 |
| 周俊 郁建兴 | 行业组织内部治理的演进与完善
——以浙江温州商会为例 |
| 刘康 | 从传媒文化看当代中国 |
| 江山 | 说我 |



学术综述

- 朱景文 冯玉军 汪公文 “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勇 “走出去”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海外专论

- 马歇尔·萨林斯 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和人性
史华慈 为政治史与思想史一辩：中国的情况
詹姆斯·多恩 债务威胁：中美关系的风险所在？

书评思考

- 曹晋 媒介与社会性别话语分析：《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书评
周国兴 一般法理学如何可能
——简评 Globalization and Legal Theory¹⁴⁴
赵玉琦 宋代贵胄的当代检视
——评美国学者贾志扬先生的《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张继平 法学的想象力

学者诗思

- 吴冠军 两种学术写作
——“后天学术奖”获奖感言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刊号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高研院兼职教授徐贲新著《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出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徐贲博士的新著《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一书于 2009 年 3 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另著有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图书信息】

作者：徐贲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3 月版



定价：¥36.00

ISBN: 9787802256187

【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 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和无绝

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日文版全本出版



2009年2月，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第四部分由日本著名学者石川英昭教授翻译出版，这样共计18万字的整部论著已经在日本翻译完毕。其中第1、2部分连续刊载于日本鹿児島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地域政策科学研究》第5号（2008年2月）和第6号（2009年2月）；第3、4部分连续刊载于鹿児島大学《法学论集》第43卷1号（2008年11月25日发行）和第43卷2号（2009年3月27日发行）上。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文版2005年首先连续刊发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第1、2、3、4期，后于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2009年2月，作为该论著讨论主题的延伸和拓展，其姊妹篇《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认为，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该书不仅提出了“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问题，同时对这个论题尝试给出了理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该书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

全书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全书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十. 媒体报道

《人民政协报》报道邓正来教授讲演：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载《人民政协报》2009年4月27日 C4版（“学术家园·讲坛”）

演讲人：邓正来

演讲人小传：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与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

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

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 WTO 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 3000 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然而当下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在我看来，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

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思想库”和“智力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全球化时代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 WTO 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结构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会。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但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说到的，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

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游戏规则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探讨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我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一书中已经初步建构了我所谓的“开放性全球化观”。我的研究表明：只有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话语争斗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

质言之，全球化实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同时，也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影响和重构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做出我们的贡献。

“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展创新，做思想库，走向世界，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秉承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转型阶段——亦即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建构“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并使之走向世界，影响全球化进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质的新阶段。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它的背景。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通过“话语争斗”维度我们再来看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实施大国战略这一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自觉担当起其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成的世界结构的裹挟和包围下成功突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且，当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不仅都制定了本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都是以其发达的社会科学为智识前提的。比如说，美国对社会科学实施了一种“普适性强势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科学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会科学的全面布局和重点机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无国界”差异和普适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资源，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加盟，实现社会科学的扩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输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获得全球化的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社会科学战略正是美国实施“单边”外交，保持单极地位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大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的战略性和时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竞争；换句话说讲，那种“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也就成了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也强调 21 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从中国学术的自身水平来看，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学术大国。过去 30 年，我们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学术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或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

会发展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可以从 2007 年度 SSCI 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看出。2007 年度 SSCI 收录 1962 种由 40 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 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 10 种，真正由大陆出版的只有一种。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其低下的。

这三个方面讲的其实是我们走出去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去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认为的第四个背景，也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可能使我们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短短 30 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希望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

在我看来，对最近 30 年中国经验的总结为我们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的某些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所做的这种努力正在世界学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他学科，像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努力。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化时代“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高度，还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都非常有必要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晚近 30 年的发展经验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的两大大瓶颈及其突破

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力还比较低呢？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我所谓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便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第二大“瓶颈”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反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

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至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科化。

显而易见，学术旨趣上的“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西方化”和“唯学科化”这两大瓶颈，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既难以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从而担当起全球化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显然，中国社会科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打破这两个瓶颈。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一个就是如何对中国进行深度的研究，切切实实地对中国进行深度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唯学科化的方式、西方化的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研究中国，也就是我们一定要重新去发现中国，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明年的主题：“重新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和它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着中国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但是如何做中国的深度研究却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解放”。现在，中国思想界有人讲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知识解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既有的那套在学术旨趣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相关链接

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把西方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翻译“引进”过来。当然这个“引进”阶段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未来也有必要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西学研究的水平还不够好。第二个阶段始于90年代初，是“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

最早是经济学、统计学这些学科，当然现在也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在这个阶段，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拿来解释中国的经验，企图复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阶段从 90 年代末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我们开始在学术规范、学术体制等方面全面和国际“接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客观地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这 30 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拿什么走向世界

现在流行的普世知识实际上是西方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知识，而经过我们的知识努力，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知识提升为另一种普世的知识。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普世知识，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言，它们都是极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首先区分两类普世性的知识。一类是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普世性知识；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西方先发达国家经验的普世性，但却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及其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比如说，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一些拉美国家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比如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世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却在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职。

按照我的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也像文学和艺术一样，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研究西方不可能胜过西方，相对西方来讲，我们的优势只能在于对中国的认识。

具体来讲，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地方。

走出去“三大战役”

近期战略主要侧重于外部推动，以举国之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创造条件，重点是把 30 年来已经形成的中国优秀论著，以及中国已有的西方学术界不得不承认的强势学科，比如说，考古、中国文化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等通过翻译的方式推向世界。目的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现状，通过外部推动以图逐步实现其创新发展的自身造血功能。

中期战略主要是争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造血和健康发展上，取得初步突破。初步突破的标志就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内创立有着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

远期战略旨在全面突破。其关键是在各种学派不断建立和涌现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真正地完全建构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比如说，可以设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馆”系统翻译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一批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论争的优秀作品和近 30 年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的优秀研究文献。还可以考虑在 985 高校设立“中国古代文化翻译研究生班”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生班”，招收英语专业学生专门从事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翻译和交流事务的人才培养工作。还有，可以考虑在 985 高校设立“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高级留学生班”，招收中国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海外博士生，让这些学生把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带回去等等。

Shanghai Daily 报道 Jeffrey 讲座: Baozi-meets-sushi like baozi-meets-hotdog

主讲人: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教授、*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主编
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

地点: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801 室通业大讲堂

时间: 2009 年 3 月 12 日

IT has long been commonplace both within and beyond Shanghai to talk about the city as a locale that connects Europe and America to China.

This idea took hold initially during the treaty-port period, when nicknames for the city as a whole (most famously "Paris of the Orient") were used to portray the metropolis as one that had ties to both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is idea was also underscored by comparably structured shorthand phrases for specific districts or streets (when the Bund was called China's "Wall Street," Nanjing Road likened to New York's 5th Avenue, and so on).

It is easy to trace the origin of a view of Shanghai as an East-meets-West setting, since, as we have seen, in the middle of the 1800s first Britain an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established special enclaves by the Huangpu River.

Then, later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it became a stop on the itineraries of famous Western tourists (from General Ulysses S. Grant to Charlie Chaplin) and a port via which Western products (from streetlights to cars, Hollywood movies to bottles of Coke, cigarettes to saxophones) made their way into China.

Throughout the late 1800s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00s Shanghai played a dual role as at least a main window (and often the main window) onto the West for many Chinese, and a main window (and again often the main window) onto China for many Westerners.

But even in the treaty-port era, it could be misleading to think of Shanghai's cosmopolitanism as simply an East-meets-West phenomenon.

The city may have been a "Paris of the Orient," but it was not only a place to which European and American products, ideas, and people came and made their marks in a Chinese setting.

There were always non-Western and non-Chinese actors playing key roles in the story of Shanghai's globalization.

If Shanghai's initial globalization deserves to be treated as much more than just a tale of East-meets-West, the same holds true in spades for the city's re-globalization.

The mixture of actors and influences is not quite the same, but it is once again very much an East-meets-East as well as an East-meets-West story.

This is true even of some developments that seem at first to be all about the revived importance of flows to the city from America and Europe.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Starbucks outlets in 2000.

Yes, this company is based in Seattle (US state of Washington) and serves drinks, such as espresso and cappuccino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Italy and France.

But when the Shanghai outlets opened, they were managed by Presidential Coffee, a company based in Taiwan.

At least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from Taiwan currently reside and work in Shanghai, with many more living between Shanghai and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corridor that is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computer industry, its answer to Silicone Valley.

Many other East-meets-East sides to Shanghai's re-globalization could be cited, which is not surprising given that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now China's leading trade partners.

(The author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The article is an excerpt from his speech at Fudan University on March 12. The views are his own.)

《文汇报》报道汤一介先生讲座：中国更应关注自身文化主体性

文汇报：2009年4月14日，教科卫新闻

讲座系列：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主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复旦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先生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

时间：2009年4月13日下午3:30

“自由经济如果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将会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近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证。”昨天，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前往复旦大学演讲。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当下的金融危机，指出中华民族应更多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在汤一介看来，曾经盛行一时的“西方价值即普遍价值”观点，已经受到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毋庸讳言，‘自由’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创造力。正因为有‘自由经济’，才使得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财富极大增长，并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受益巨大。正因为‘自由思想’，才使得科学、文化日新月异。但这种‘自由’过了头，没人管，问题就来了。”汤一介说，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已被证明，它远非完美的制度。

随着“自由经济”学说的衰落，将“自由”奉若圭臬的西方中心“普遍价值”也黯然谢幕。“‘自由经济’还让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同一国家内部的差距越来越大；‘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扼杀着人文精神。”汤一介表示，“不过，并不是说‘自由经济’就没有意义。我个人认为，它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要素。而且，这也是我们进入‘和谐’的后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我们可以在‘求同存异’中找寻某些民族文化特有理念中的‘普遍价值’的意义。”汤一介说，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要素，即使放在当下的社会，依然具有其普遍价值。

他说，“不同民族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观念，甚至可能因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过，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将为我们提供对话和交谈的平台，在讨论中达到某种共识。当然，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提升，这正是‘和’的作用。”

“‘天人合一’是先秦时期就提出的观点。这样的思想对当前自然界遭受惨重破坏的现状，可以说很有意义，因此也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另外，中庸的观念在我看来，无疑是走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手段，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的‘思想资源’。”

不过，汤一介也表示，“用某个国家，某个文明的价值来代替普遍价值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尽管出发点不同甚至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各民族的文化中原来就有很多相同的、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念。”

网络查询不能替代背诵经典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掀起了“国学热”，“如今国学没有降温，而是更热了，特别是通过教育在少年儿童中普及国学，更加盛行。”汤一介认为。

“杨振宁曾经说，小时候非常不理解长辈为什么逼着他背诵古籍，但他后来坦陈‘年龄越大，觉得帮助越大’。”汤一介说，现在学生不喜欢背诵，因为什么都可以到网络上查，其实这是远远不能取代背诵的。要培养孩子从小读经，尤其是背诵诗词。因为借助音调的起承转合，孩子们能加深理解，从而提高修养。

“现在我们很强调读经的好处，但却没有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汤一介指出，中国的独生子女特别娇惯，甚至有些不懂礼貌，惟我独尊，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强调礼仪，强调人与人关系的处理，所以国学热不能停留在读经阶段，而是要真正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通过国学的深入和普及，使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成为一种自觉。

本报记者李雪林 实习生曾明辉

<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090414/WH09041406.pdf>

十一.学术工作坊

《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结束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高研院学术委员会于4月21—23日对2008年立项的五个跨学科工作坊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中期检查。

针对周怡、贺东航、刘春荣、何慧丽和王庆明五位项目负责人提交的中期报告，高研院学术委员会从如下六个方面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审议：（1）项目调研和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实质性进展情况；（2）较为明确的下一步研究计划；（3）项目研究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4）预期成果提交和项目结项时间；（5）签定工作论文的版权合同；（6）项目负责人认为必要说明的其他事项，等。

经过严肃的学术考评，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五个项目组的中期汇报，批准下一步研究计划。

十二.附录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出版资助基金项目申报启事

一、宗旨

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拓展和提升中国学术研究，鼓励和资助社会科学领域卓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翻译作品出版，特设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资助基金项目。

二、资助对象

本项基金主要资助两类对象：

(1) 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或高水平经验研究。要求内容侧重中国问题的研究。该类论著纳入“中国深度研究文丛”系列。

(2)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翻译作品。该类作品纳入“社会科学理论译丛”系列。

三、申报要求

1、本项基金属于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优秀成果。申请人申报的成果应是完成 80% 以上并且尚未出版的中文书稿，字数不少于 15 万。

2、下载填写“出版资助项目申报表”，表格及作品电子版发送至 king0925@yahoo.cn，邮件主题请注明：“申报高研院出版基金项目”。

四、评审及管理

1、高研院科研办公室将在收到申报书 5 日内邀请 5 位评审专家进行双向匿名学术评审，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确认后，60 日内通知申请者本人评审结果；

2、获得基金资助的作品将根据高研院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协议，在指定的出版社出版；

3、项目负责人应该遵照相关管理规则使用项目成果和资助资金，作者应该在作品显著位置标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资助项目”；

4、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项目结项办法”办理结项手续；

5、如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或结项后发现该项目研究存在学术失范或其他与管理规定相悖等问题，高研院将随时撤销该项目，并追讨全部资助资金。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 年 4 月 2 日